

# 伊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姜英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 从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西方方式的现代化道路、霍梅尼时代的经济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以及近年来的抵抗型经济政策,伊朗经济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主要源于伊朗经济发展存在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石油型经济、政治派系斗争以及西方国家制裁。伊朗经济严重依赖石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和石油产量影响明显。伊朗经济发展深受政治影响,在伊朗巴列维时期表现为王权与教权、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表现为总统与领袖之间、改革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后霍梅尼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与美国交恶,伊朗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和金融制裁,内贾德任总统时期强硬的伊核政策导致制裁加剧,几乎隔绝了伊朗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严重影响伊朗经济发展。展望未来,伊朗经济发展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不会在短时期内有所改变,从而导致未来伊朗经济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这也对中伊共建“一带一路”产生影响。

**关键词:** 伊朗; 经济发展; 结构性矛盾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F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8)08-0044-07

1979年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同年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法基赫”统治为基础的神权政治国家。2017年伊朗GDP约为4434亿美元,人均GDP5250美元。<sup>[1][P10]</sup>是中东仅次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的第三大经济体,是中东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大人口大国,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丰富,工业体系比较完备,但基础薄弱。从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白色革命”到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时代的激进“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以及近几年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政策”,这些经济发展举措均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并未有实质性提升。2018年伊始,伊朗发生大规模骚乱,起因即民生问题。那么,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有哪些?对中伊共建“一带一路”会产生何种影响?

## 一、伊朗经济发展:从西方化到伊斯兰现代主义

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优越的战略地位,是伊朗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从19世纪开始,伊朗就沦为英国和俄国的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极向中东扩张,伊朗成为英美争夺中东石油产地的重点。20世纪30年代伊朗开启经济现代化,并在二战后的50年代和70年代中期出现两次较大的经济发展。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政教合一国家,说明“白色革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性,从而探索伊斯兰现代主义发展道路,伊朗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伊斯兰能解决”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响亮口号,也是其政治总纲领。它从宗教理论上指出只有伊斯兰才能解决当代伊斯兰国家、社会及个

作者简介:姜英梅(1975—),女,山东招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东经济发展和中东金融问题研究。

人所遇到的问题。但是,由于缺少正常的发展环境,以及伊朗自身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伊朗经济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 (一) 巴列维王朝经济现代化(西方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伊朗为维护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开始了现代化改革之路。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继承其父礼萨·汗改革的基本原则,但在现代化改革的范围和力度上都比前者来得更猛烈。由于西方强国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起飞,代表世界经济、军事和技术的最前沿,巴列维国王企图凭借石油美元和美国的支持,复制西方国家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改变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化强国。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伊朗现代化表现为“全盘西化”,经历了石油繁荣引发的“疯狂的现代化”阶段。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虽然改变了伊朗传统经济结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发展极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最终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最终远走他国。

#### (二) 霍梅尼时代经济伊斯兰化

霍梅尼经济发展思想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正、平等、互助”是伊斯兰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优于二者的“健康经济”。在霍梅尼伊斯兰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和政府干预的扩大构成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伊斯兰化经济举措的宗旨所在。经过激进的国有化和伊斯兰化,伊斯兰共和国经济机制从巴列维王朝时期自由的市场经济转向僵化的计划经济,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严格限制私营经济发展。这种激进的伊斯兰化并没有为伊朗人民带来福音,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导致伊朗外交上更加孤立,再加上两伊战争的影响,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sup>[2] (P184)</sup>

#### (三) 后霍梅尼时代经济有限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逐渐从西欧和北美蔓延到全球。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东许多国家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无以为继,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和贷款,在这两大机构指导下开始了大范围的结构

调整。1989年霍梅尼去世和1989年宪法修正使“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经济发展出现新转机,结束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时代,逐步开始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但是相比其他中东国家,这些改革与调整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且不能违背伊斯兰教法原则。哈梅内伊认为“我们并没有追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通过伊斯兰的方式来满足人民需要。”<sup>[3] (P150)</sup>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伊斯兰神权政治原则下实行有限自由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在务实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经济政策倾向于改革开放;而在保守派内贾德总统时期,经济政策相对保守,更强调社会公正;外交领域的强硬立场及由此而来的制裁使伊朗经济接近崩溃边缘。

#### (四) 抵抗型经济政策<sup>[4]</sup>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质疑。中东各国在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纷纷“向东看”,对中国经验产生了浓厚兴趣。针对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议,以及经济结构性的问题,2014年2月伊朗领袖哈梅内伊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抵抗型经济总政策纲领,确立了伊朗经济的发展战略。哈梅内伊指出,伊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以及求发展的决心,如果奉行一种源于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本土的新经济模式,不仅能够战胜所有的经济困难,而且能够打败敌人强加的经济战。这种经济模式不仅是伊朗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选择的道路,它能增强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抗压性。2013年8月务实改革派鲁哈尼上台执政,贯彻实施抵抗型经济思想,采取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政策,带领伊朗经济止跌回升,尤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卓有成效。2017年5月鲁哈尼竞选连任成功,承诺在第二任期内继续执行抵抗型经济政策,刺激国家经济,降低经济脆弱性和外国压力。然而,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治理不善导致伊朗民生压力偏大。2018年伊始,政府提高燃油价格和改革补贴政策,引发国内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对贫穷、高失业率和腐败的愤慨,几乎各个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 二、伊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神权政治体制,确保伊朗政治相对稳定,且未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石油美元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神权政治和石油型经济也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性矛盾。<sup>[3][P3,247]</sup>此外,由于美伊长期对峙,伊朗作为中东唯一的什叶派政权与其他逊尼派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致使伊朗缺乏良好的发展环境,具体表现为西方国家及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这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矛盾。

### (一) 石油型经济

石油型经济是伊朗经济结构上的弊病,即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明显。石油天然气工业是伊朗财政收入、外汇收入主要来源,约占总收入一半以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sup>[1][P10]</sup>

从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的现代化改革,到霍梅尼时代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到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再到内贾德的保守政策,历届政府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促进非石油经济发展,力图摆脱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但并未取得多大成效,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仍以石油收入为主,伴随石油价格和石油产量波动而变动。以财政收入为例,从1970~2010年,在石油价格暴涨的1974年,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最高达到70%,税收收入为30%。而在石油价格暴跌的1986年,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降至40%。2012年西方加大对伊朗制裁以后,伴随石油产量下降、国际贸易结算困难以及石油价格下跌,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甚至降至31%。<sup>[5][P426]</sup>石油贸易在伊朗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石油出口收入成为伊朗经济发展主要资金来源。20世纪70年代原油和天然气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97.8%,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非石油产品出口出现快速发展,石油出口收入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截至20世纪末,石油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仍高达85%左右。这说明伊斯兰共和国将石油型外贸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外贸结构的努力基本没有成功。2011~2015年,受低油价和欧美制裁影响,石油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81.7%降至54.7%,2017年为66.7%。<sup>[1][P11]</sup>但这并不能说

明伊朗经济多元化和出口多元化目标已经实现,只不过是油价持续下跌,导致石油出口收入减少,当然,伊朗大力发展非石油产品出口的努力也值得肯定。

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为伊朗带来巨额石油美元,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本资源。然而,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在国际油价下跌时表现出极大的经济脆弱性。油价低迷之际,鲁哈尼政府致力摆脱对石油经济的过分依赖,政府预算中的石油收入占比逐年下降,振兴工业以“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是鲁哈尼政府重要经济目标。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贸易和金融制裁,伊朗石油产量和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内贾德执政后期,伊朗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伊朗丰富的油气资源、广阔的市场决定了石油工业仍具有极强的投资吸引力,除美国外的世界石油公司,尤其是欧洲和亚洲公司,都将参与伊朗油气资源的重新开发。但是,国际低油价、新油气合同久拖未决、国内投资环境以及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和新制裁措施都将成为影响伊朗石油工业的重要因素。

### (二) 政治派系斗争

伊朗经济发展深受政治影响,伊朗政治上的结构性矛盾,在伊朗巴列维时期表现为王权与教权、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表现为总统与领袖之间、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后霍梅尼时代,表现尤为突出。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法基赫的统治”的神权政治体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宗教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巩固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革命成果是历届政府施政纲领的基本原则,这也是领袖权威的前提条件。伊朗政治体制决定了总统位置的权限,因此,无论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还是鲁哈尼,他们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对外开放、私有化和自由化举措,都不能逾越这一原则。一旦改革触犯了保守派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就会招致他们的批评和阻挠。宗教领袖作为最大的保守派,在其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遭受威胁之际,就会动用宗教领袖权威压制改革派。这也是改革派历届政府经济目标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哈梅内伊宗教资质比霍梅尼弱,在其任宗教领袖时期,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前的斗争异常激烈,宗教领袖只能通过平衡政治,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和宗教权威,这也是保守派和改革派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sup>[6]</sup> 2017年3月的专家会议上,领袖哈梅内伊认为本届政府施政只实施了一部分抵抗型经济措施,如果政府执行了所有抵抗型经济措施,那么今天的伊朗经济状况和民生情况将显著不同。他呼吁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执行抵抗型经济政策,因为这是解决伊朗目前问题的唯一途径。<sup>[7]</sup> 伊朗各界也有人质疑伊核协议是否符合领袖的抵抗型经济政策。对此鲁哈尼不止一次表示,他的政府始终坚持抵抗型经济政策,并将该政策贯彻到底。2018年1月份,伊朗爆发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保守派借机指责鲁哈尼政府政策失误。抗议示威活动爆发后,领袖哈梅内伊也承认,尽管这次骚乱背后有外国势力煽动,但这并不是说伊朗国内自身就没有问题。他呼吁伊朗国内所有政府官员、不同政治派别团结一致,携手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穷人所面临的问题。然而,2018年5月8日,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称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这更成为保守派攻击鲁哈尼的口实。此外,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还包括普遍的贪腐、影子集团的活动,例如伊斯兰基金会和革命卫队,他们拥有大量、隐藏的经济利益,反对政府改革政策。目前伊朗经济的85%仍由官方或半官方控制。<sup>[8]</sup> 大量政府附属企业和准政府企业的存在,既是政府私有化一大掣肘,还对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发展造成困难,限制了私营部门的投资。

伊朗政治结构上的矛盾决定了伊朗无论是拉夫桑贾尼还是后来的继任者,没有政治改革做先导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而政治改革又是一个涉及法基赫体制形式的大问题,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朗国内改革的复杂性和缓慢性。<sup>[9]</sup> 相比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政权确保伊朗具有较好的政治稳定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伊朗神权政治体制仍将保持相对稳定,伊朗政治结构上的矛盾仍将被束缚在法基赫体制框架之内,改革的稳步推进与维护伊斯兰政权的根基同样重要。但是,哈梅内伊之后,谁将出任下一任和下一任宗教领袖?能否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和宗教合法性?能否在维护伊斯兰政权与推进改革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伊朗探索未来经济发展之路、并成功转型,可谓前路曲折。

### (三) 外在结构性矛盾——制裁

多年来,伊朗经济一直与外部政治、外交事

态发展相关联。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长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通过切断伊朗与国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来限制其经济增长),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矛盾,其中尤以美伊关系最为关键。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朗人质危机后,伊美两国断交,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冻结伊朗在美国的海外资产达几百亿美元。1996年8月美国通过一项为期5年的“达马托法”,加强对伊朗和利比亚的制裁。2002年,因伊核问题,美国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此后安理会通过4项对伊朗制裁决议。自2008年以来,美国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2010年美国敦促安理会通过1929号决议,对其他国家对伊朗能源领域投资施压,迫使西方国家的石油企业中断或撤离伊朗油气项目,限制或禁止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与伊朗银行开展国际金融结算业务。同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继续延长自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经济制裁。2012年6月,美国对伊朗金融制裁法案生效。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国也相继推出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对伊朗单边制裁措施。联合国及欧美对伊朗制裁主要是能源和金融领域。在能源领域,迫使其他国家减少从伊朗石油进口,并停止石油领域投资。在金融领域,禁止伊朗银行使用SWIFT系统,禁止第三国银行与伊朗银行的大宗金融交易,并冻结伊朗银行在海外资产。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达到1300亿美元(伊朗央行称伊朗海外资产约1000亿欧元),<sup>[10]</sup>除了资本资产还包括被封锁在外的石油款,主要是向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出口的石油款。在贸易领域,通过对伊朗国有海运公司的制裁,切断贸易路线,通过将伊朗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对伊朗正常的经贸结算和投资造成影响。制裁切断了伊朗能源进出口、金融跨境业务和对外贸易,严重破坏了伊朗经济,制裁大大打击了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伊朗与世界的金融联系。制裁不仅恶化了伊朗经济,还吓跑了外国投资者。欧洲外资纷纷撤出伊朗,亚洲企业在伊朗开展规模经营也数量有限。截至2012年12月,伊朗受到制裁的实体达到490个,个人达到150人。<sup>[11]</sup> 制裁严重影响了伊朗经济发展,到2012年底,伊朗经济收缩6.6%,2013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9.3%,失业率也增加到13%。伊朗20年发展规划目标是2025年伊朗成为中东最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充分就业。然而

内贾德两届任期内,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失业率超过10%,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于5%。唯一值得肯定的是贫富差距缩小,基尼系数从0.42下降到0.25。然而,非石油出口增速从2006年的25.2%下降到2013年的6.1%,伊朗经济接近崩溃边缘,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更令伊朗经济雪上加霜。

2013年鲁哈尼执政后,对外实行“温和主义”外交政策,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于2015年7月14日推动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就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为伊朗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国际环境。2016年随着伊核全面协议生效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石油产量基本恢复到制裁前的水平,石油及非石油产品出口大幅增长,银行体系重新与SWIFT相连。伊朗经济增长率从2015年的-1.3%大幅提升到2016年的13.4%,2017年也达到4.5%的较高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从2015年的20.5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43.1亿美元,<sup>[1][P12]</sup>但仍与政府吸引外资目标相去甚远。尽管2015年7月伊核问题六国、欧盟和伊朗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依然存在,从而打击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国际上的大多数银行仍选择避免与伊朗银行开展美元业务,从而阻碍伊朗吸收外资、重回国际金融体系。目前伊朗对外贸易仍不得不采用易货方式,或者采用欧元、本币为结算货币。2018年5月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并且将在宽限期过后适用于任何美国之外和伊朗有商业来往的企业。这对国内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亟须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的伊朗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总之,伊朗要实现2025远景规划目标——把伊朗建设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领域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破解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上的两大痼疾,并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三、伊朗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伊朗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平稳发展,两国高层保持接触,2016年1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伊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为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及非石油产

品出口市场和第五大外资来源地。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第三大贸易伙伴,全球第六大原油进口来源地,以及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和投资目的地。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3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0%,其中,中国对伊朗出口186.0亿美元,自伊朗进口185.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3%和25.3%。

#### (一)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鉴于伊朗经济发展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伊朗地缘政治短时期内尚难有根本性转变,伊朗经济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对中伊“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

首先,美伊关系是关键。虽然西方国家解除了对伊朗与核问题相关的制裁,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对伊朗投资信心,但美国仍保留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对那些在伊朗投资的外资公司构成重大风险。2017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访沙特时指责伊朗“助长教派冲突和恐怖的火焰”,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孤立伊朗,意图打造中东版北约。此外,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同样也是伊朗国家安全的隐患,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仍将伊朗视为重要威胁。2017年6月,卡塔尔断交危机就与卡塔尔与伊朗发展关系脱不开干系;实际上,沙伊之争背后是美俄之间的较量。2018年5月21日,美国宣布12项对伊制裁措施,那些已经进入伊朗的外国企业正考虑是否撤出伊朗市场以避免美国制裁。缺少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必将对伊朗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第二,伊朗国内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并不理想。一直以来,国内政治和宗教强硬派与务实改革派意见分歧和政治斗争不断,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力度,有时会导致投资项目流产。这是因为经济改革措施较之西方解除制裁更为重要。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截至2017年7月,旨在吸引外资、促进伊朗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的新石油合同已被多次推迟,正在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在伊朗进行商业活动前五位的障碍分别是融资困难、政策不稳定、通胀严重、政府效率低下及基础设施差。伊朗对外资公司股份、劳工条款、外商合同条款及利润汇出设有诸多限制。截至目前,伊朗金融系统仍无法使用美元结算,从而对投资和贸易结算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伊朗核问题仍有逆转的风险。2018年1月,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次延长美国针对伊核问

题的制裁豁免期。5月8日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伊朗方面则一方面坚持不会就伊核协议重新谈判,另一方面积极与欧盟、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沟通协商,争取他们留在伊核协议内。尽管欧盟在伊朗有很多利益,如道达尔、西门子、空客等公司伊核协议签署后积极开展对伊投资,但在美国强大制裁压力下,他们能坚持多久还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会不会再度执政、并重启核计划,还有待观察。但毋庸置疑,对于一个经济缓慢复苏的经济体而言,伊核协议的终结绝不会是好兆头。

第四,伊朗经济结构仍以石油为主,经济依然脆弱。根据伊朗国家统计局最新报告,由于原油及相关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大增,伊历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伊朗经济增长8.3%,非油经济增长6.3%。世界银行发布的中东北非经济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伊朗经济增速为6.4%(IMF6.5%),主要原因为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增速较高。<sup>[12]</sup>但是该报告指出,伊朗中期增长前景一般,原油已经接近产能容量,非油行业低迷,除非外国直接投资复苏、伊朗重新联系国际银行体系、伊朗国内改革取得更多进展,否则非油经济不会快速增长。

第五,深化经贸合作面临来自伊朗国内的阻力。出于国家安全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伊朗政府对于两国战略对接问题仍持谨慎态度。中国在中东的“软实力”还很有限,伊朗民众并不认可中国发展模式对其具有吸引力,认为中国廉价商品廉价劣质,还损害伊朗本国工业,导致伊朗外汇减少、工人失业。政府内部有人认为伊朗不应该从依靠西方转向依靠中国,也有反对“向东看”的声音,认为伊朗应该和不同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合作多样化,中国不是唯一选择。

第六,双方文化差异较大。中国是儒家传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无神论。伊朗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朗人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极强,多数人认为中国应感谢伊朗源源不断地提供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伊朗人骨子里更是仰慕西方国家,认同欧洲标准。例如,在中国承建的工程承包项目里,不允许使用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只能使用欧盟产品。<sup>[13]</sup>中国企业在伊朗将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来自欧盟、日本和韩国的竞争。

## (二) 对中伊共建“一带一路”的建议

中伊共建“一带一路”前景看好,但由于存在

诸多阻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未来双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沟通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一,抓住伊朗改革派总统开放发展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伊朗2025年远景规划目标,敦促伊朗改善投资环境,在税收、法律、政策和行政审批等方面给予外资优惠政策,促进中伊能源合作和产能合作。

第二,中国企业要做好功课,充分了解伊朗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商业生态,把握其未来发展道路走向。加强与伊朗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解其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并为后哈梅内伊时代做好应有的准备。

第三,美伊关系是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美伊关系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做好协调工作,为伊朗未来发展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四,鉴于第三方因素干扰,中国应加强与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中东地区大国的沟通交流,避免地区形势变化引发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误解与矛盾。当下的要务是联合欧盟、俄罗斯等国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获得美国对伊朗新制裁措施的豁免权。

第五,加大培育复合型人才,既懂波斯语,又通晓市场规律和国际形势。伊朗很多文件都是用波斯语书写,运用波斯语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在后期的工作中非常重要。

第六,熟悉伊朗法律,并遵纪守法。了解伊朗当地法律法规、双边投资协定、税收体系,并与具有实地工作经验、熟悉当地情况的国际商务专业律师事务所合作。

第七,如果不能从行业或部门最高层来入手,选择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也非常重要,并与之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八,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是中资企业应对竞争最好的办法。中国企业还可以与其他国家企业合作,扬长避短,互利共赢。

第九,建立中国与伊朗的投融资体系,例如合理利用伊朗存放在中国金融机构的石油款,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消除美国金融制裁对投资贸易的影响。

第十,加强人文交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强民间沟通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 [参考文献]

- [1] EIU. Country Report – Iran , April 2 2018 , p. 10.
- [2] 王铁铮. 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 [3] Ali Gheissari , Contemporary Iran: Economics , Society , Politic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 [4] 陆瑾. 试析鲁哈尼“重振经济”的路径和制约——兼议哈梅内伊的“抵抗型经济政策”[J]. 西亚非洲 2014 ( 6 ) .
- [5] Edited by Europa Publications ,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16 62nd Edition , London: Oxon Routledge , 2015.
- [6] Evalaila Pesaran , Iran’s Struggle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Reform and Counter – Reform in the Post – Revolutionary era ,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 London and New York 2011.
- [7]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鲁哈尼: 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抵抗型经济政策 [EB/OL]. [2017 – 05 – 11] <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3/20170302536716.shtml>
- [8]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伊朗经济的 85% 由官方控制 [EB/OL]. [2015 – 8 – 2]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506/20150601013386.shtml>
- [9] 蒋真. 宗教与政治: 当代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困惑 [J]. 西亚非洲 2012 ( 2 ) .
- [1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伊朗有 13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海外 [EB/OL]. [2016 – 06 – 02] <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7/20150701053339.shtml>.
- [11] Ruairi Patterson. EU Sanctions on Iran: The European Political Context” , Middle East Policy , Vol. XX , No. 1 , Spring 2013 , PP. 135 – 136.
- [12]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伊历去年伊朗经济增长 8.3% [EB/OL]. [2017 – 06 – 04] <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6/20170602586052.shtml>.
- [13] 田文林. 中国在伊朗的利益评估 [J]. 国际研究参考 2014 , ( 8 ) .

##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a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IANG Ying – mei

(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7 , China)

**Abstract:** From full Westernization of the Pahlavis period to radical Islamization of the Khomeini period , to limited liberalization of the Post – Khomeini period , and even to the resistance economy at present , Iran economy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re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Ir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 namely , oil – based economy , political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Western countries’ sanctions. Iran’s economy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oil , which is the main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income and financial revenue , but which is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fluctuations and oil production. Th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a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litics. The struggles in political , economic , social ,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spects have never stopped between the royal power and the religion power in the period of Pahlavi ,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religious leader , the reformers and the conservatives in the period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 especially in the post Khomeini era. Finally , Iran has long been sanctioned in economy and financ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an. In the future , the three major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an will not chang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 resulting in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China and Iraq.

**Key words:** Ir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责任编辑: 阮凤平)